

近期,由作家、学者薛澣和孔庆东所著的《梦游九天——金庸的醉侠世界》,由东方出版社出版。本书是目前最为完整的金庸传记,一直写到金庸先生二〇一〇年九月获授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作者对金庸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进行了全新的定位,很多观点非常新颖独到。下面节选一段文字,以饕读者。

初入江湖的金庸

上世纪五十年代,金庸为别人打工时,常以笔名“姚馥兰”和“林欢”来写影评等,并且创作电影剧本,对各种艺术样式都产生了浓厚兴趣,甚至学过芭蕾舞,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当时罗孚是《新晚报》总编辑,后来他回忆出一个有趣的小插曲:“他(金庸)有一段时间去学芭蕾,在一次报馆的演出中,他还穿上工人服,独跳芭蕾舞,尽管在艺术上那是不合格的,却是令人能够留下印象的。”

《新晚报》轻松愉快的风格,使金庸身心都得到相当的舒展。在这里,他遇到两位重要朋友,一个是罗孚,另一个便是与他志趣相投、才华并称,日后也成为“一代大侠”的梁羽生。梁羽生本名陈文统,广西蒙山人,小金庸一岁,毕业于岭南大学经济系,也是《新晚报》的副刊编辑。他和金庸都爱下棋,闲来无事常摆局对弈,并同在《新晚报》上撰写棋话,皆十分精神。两人更有一个共同爱好,那便是武侠小说。书生论武,分外兴致,如《蜀山剑侠传》、《十二金钱镖》等旧武侠小说,一旦谈起,都兴致勃勃、口若悬河。此

时,金庸或许还不知道,他生命中一项重要事业便要由此起步,一代新派武侠,已经呼之欲出了。

金梁当时谈侠论剑,兴致虽高昂,又都有文字创作经历,却尚无亲自操笔上阵之心。新派武侠小说的“药方”已齐,“药引”未备。到一九五三年,“引子”终于来了,当年香港两位拳师的一场比武,便是导火线。

这两位拳师,一是太极派的吴公仪,一是白鹤派的陈克夫,武无第二,他们既要分出高下,便选了擂台比武的方式。然而当时香港禁止打擂,澳门却不禁,所以他们把擂台设在澳门的新花园。消息传出,立刻引起好热闹、喜猎奇的香港人的注意,报纸更是将此为新闻热点,大肆宣扬。《新晚报》自然不甘落后,立刻出一个“号外”,结果是瞬间卖空。尽管比武当场,并无报界事先渲染的紧张刺激,数分钟便分出胜负,但市民对于比武、争斗胜负的爱好,引发罗孚的灵感,便有了在报纸上连载武侠小说的想法。

深知手下这群干将平素对于武侠的爱好,罗孚决定就地取材,叫他们变“说”为“写”,必受读者

欢迎。他先找文史造诣颇深的梁羽生,梁一口答应。比武次日,《新晚报》便刊出即将连载武侠小说的预告,读者自然感兴趣。梁羽生果然不负厚望,仅仅酝酿一日,《龙虎斗京华》便开始见报,一路连载。

日后看来,这部小说仍不脱许多旧武侠小说的套子,“其所用模子、回目、笔法无一不‘旧’”,甚至部分故事情节、人物亦明显套自白羽《十二金钱镖》(叶洪生语),但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却令他们耳目一新。小说曲折的情节、生动的打斗、激烈悲伤的感情,让读者产生强烈的兴趣,报纸销量大幅上翻。《龙虎斗京华》打响,香港报界顿然掀起武侠小说热。梁羽生声名日隆,各大报纷纷前来看约稿,分身乏术,罗孚又“挖”出金庸。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金庸见梁羽生一举成名,不甘落后。但他之前从未写过武侠,一时不免棘手苦思,最终决定从自己最熟悉的家乡着手,选择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故事——乾隆身世之谜,写海宁传说里的乾隆是陈阁老的儿子这件事。故事里引入历

史上的真实人物,给真人披上传奇的外衣,虚实转换间令读者心理上既感亲切可信,又能随作者的想象驰骋翱翔。金庸熟读《三国》,知道这种虚实之间的妙趣。可是作为武侠小说,笔下虚构的人物,其发挥余地比历史上实有其人的角色更大,更能表达作者的独创性。金庸为此虚构了他的第一个主人公——书生侠客陈家洛。一九五五年,《书剑恩仇录》(又名《书剑江山》)诞生,“金庸”这个笔名也第一次问世。

在陈家洛身上,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是江南陈家的儿子,乾隆的亲兄弟,又是反清复明组织的头领——复杂的身份带来了他的复杂性格,陈家洛在金庸小说人物系列中,固然算不得可爱,但他性格的丰富性,并不逊色。

有梁氏小说参照在前,《书剑恩仇录》已经基本摆脱了旧派武侠的路子,虽仍沿用旧体诗词回目,遣词造句上却开始走西方小说和新文学的路子。

值得注意的是,从第一部小说起,金庸武侠中“侠情”结合,非常鲜明,情爱给人留下的印象极



金庸

深,尤其花费大量的笔墨描绘女性。尽管后来有人批评金庸对女性的描写过于浅薄片面,但他的女性角色,称得上各式各样、丰富多彩,各有魅力。

《书剑》中的陈家洛,和两位少女之间的爱情悲剧,更为吸引读者。她们性格上的差异非常典型:霍青桐才干出众、个性鲜明;香香公主美丽绝伦、天真纯洁。通过陈家洛在两位少女中的抉择,金庸写出了他的性格悲剧。霍青桐至今仍是金庸笔下最惹人喜爱的女性之一,香香公主虽被讥为“花瓶”“木头”,但把她写得那样完美无瑕、纯真清澈,开金庸小说中女性“美”之先河,叫人难忘。

《书剑恩仇录》是金庸的开山之作,情节曲折、描写细腻,出手不凡,融入历史宗教、天文历算、琴棋书画、诗词典故、阴阳五行、奇门遁甲、儒道佛学等元素,引起极大的轰动。小说把研究乾隆是否汉人一事,推到高峰。

金庸在三联版后记里说,这部小说“最初在报上连载,后来出版单行本,现在修改校订后重印,几乎每一句都曾改过。”

族民歌演唱原理》中说:

“汉族歌曲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长调则是人与自然的交流。因为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听众稀少,寂寞的牧民在马背上抒情,所以长调是唱给大自然的赞歌,是对大自然的膜拜——草原、森林、牧群、河流、峡谷、雄鹰、太阳、月亮、星星……长调是与苍天对话,大地絮语。长调节奏是马蹄声、咩咩声、风声雨声树梢声。长调抒情的至高境界——天籁与心籁浑然一体。长调因地域不同而有永恒的主题——藏族长调歌唱雪山、蒙古族长调歌唱草原。

记忆中的草原成了沙漠,库布其沙漠的西头成了戈壁墙。长调是唱给大自然听的,大自然被破坏成了这样,我们唱给谁听呢?蒙古语言文字是蒙古文化的载体。如果蒙古语言和文字都成了边缘文化,那还谈什么弘扬蒙古文化?“尽管申遗成功,但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程度、保护程度,还是让拉苏荣深感忧虑:”对长调来说,仅仅从人类之宝的角度去进行单一传承难以达到目的,只有复合型的培养才能保证长调的生命,只有保护好长调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保护好我们的一片绿色,让生态平衡,让艺术与自然达到一种和谐,才能真正保护长调艺术。”

向阳湖小记

崔道怡

六千五百米的围湖堤坝,两个月里便修筑了起来——数九寒天,我是光着脊梁肩挑重担攀上陡坡的。

一千八百亩的荒滩造田,赶在春耕前开垦了出来——沼泽地里,我是赤着双脚踉踉跄跄步履奋进的。

不到半年,环湖的一座座山坡上,一幢幢红砖房屹立于丛丛翠绿的竹林中。干校盖房所用的细沙和土坯,大都是由中国作家协会所组成的五连战士,在河湾,在旷场,一锹锹挖出来,一块块打出来,一箩箩筛选的,一片片晾干的。每逢落雨,一切能当苫布用的东西,全都盖在细沙与土坯堆上,战士们淋着雨仍奋战不息,要的就是这种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然而当地农民对这种精神很不理解:又不是“双抢”怕误了农时,何必要下雨天去筛沙呢?雨水淋湿的沙,如何能够筛得好,岂不是白耽误了工夫么!待到天晴日子,反而不干农活,关在屋里

“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耳熟能详的台湾民歌《外婆的澎湖湾》,点燃我前往澎湖的欲望。从台北飞到澎湖,我的第一游览目标当然是“外婆的澎湖湾”。令我惊讶的是,我手头的几份不同的澎湖旅游地图上,居然都没有标明“外婆的澎湖湾”!

“外婆的澎湖湾”究竟在哪里?

向澎湖朋友一打听,才知道“外婆的澎湖湾”众说纷纭,各说各话。原因是澎湖并无“澎湖湾”这一地名,一九七九年台湾音乐人叶佳修为澎湖歌手潘安邦写了歌曲《外婆的澎湖湾》,那“澎湖湾”一词是叶佳修“创作”的。随着《外婆的澎湖湾》在台湾唱红,特别是一九八九年潘安邦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的演唱,这首台湾民歌从此红遍海峡两岸。很多人冲着《外婆的澎湖湾》这首歌前往澎湖,可是到了澎湖却找不到“外婆的澎湖湾”。尽管“澎湖湾”是虚构的,但是面对那么多要去“澎湖湾”的游客,澎湖人总得有个说法吧。

澎湖是群岛,总共有九十个岛屿,大大小小的海湾不计其数,究竟哪里算是“澎湖湾”呢?虽说答案五花八门,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澎湖人以为,“澎湖湾”应是澎湖风景最美的海湾。这么一来,确定哪里是“澎湖湾”,变成了澎湖海湾的一场“选美秀”。有人以为连接西屿岛和白沙岛之间的跨海大桥那一带海湾最漂亮,应是“澎湖湾”;还有人以为澎湖群岛最南端的七美岛的“双心石沪”海湾最美,那里才是“澎湖湾”;不过,大多数数人以为,“澎湖湾”应当在澎湖群岛的最大的岛——澎湖本岛周边。不过,澎湖本岛四周的海湾也很多,所以澎湖的朋友对我说,往往每一个旅游团的导游带游客所去的“外婆的澎湖湾”都不一样!可是,我和妻属于“自由行”,没有导游,而地图上又没有标明,到哪里去找“外婆的澎湖湾”呢?

终于一位澎湖朋友告诉我,最被认可的“外婆的澎湖湾”,在“将校眷村”那里。我在台湾访问过各种各样的眷村,那是一九四九年蒋介石败退台湾时,为了安置大批来自大陆的国民党军将士及其眷属,在台湾各地兴建的一

批简陋的房舍,形成了一个个眷村。我在澎湖本岛西南的顺承门走向新复路、介寿路,看到一大片眷村。这里的眷村不像台北的眷村那么拥挤,特别是国民党将官和校官住的将校眷村,相当宽敞。歌手潘安邦一九六一年就出生在这里,因为他的父亲潘时骅是国民党少将。潘安邦的姑妈潘希真是台湾名作家,笔名琦君,她的代表作《橘子红了》曾经被改编成电视剧。受姑妈影响,潘安邦从小喜爱文艺。给潘安邦的童年最大温暖的是慈祥的外婆,常常

带着他到眷村前的海滩散步,抓鱼,挖海螺。潘安邦长大了,离开外婆到台北去打拼,外婆恋恋不舍。他跟叶佳修说起外婆的故事,使叶佳修深受感动,为他“量身定做”写了《外婆的澎湖湾》。

我从将校眷村走向海滨,那里有一大片翠色可餐的草地,令人赏心悦目。绿草包围着一座铜雕,这一头是慈祥可亲的外婆,那一头是正在沙滩上玩耍的小孙子,他的下方有蟹、有鱼、有虾。这座铜雕生动地再现了外婆与孙子的浓浓亲情,是为了纪念《外婆的澎湖湾》而雕塑的。沿着草地上的石径向前走,前面是一片辽阔的海湾。正值黄昏,一抹金色的夕阳染红了整个海湾,波光粼粼,浪尖上仿佛有万千金珠在滚动,美不胜收。这不正是“外婆的澎湖湾”吗?

后来,我乘长途汽车去了跨海大桥,也乘海轮去了七美岛的“双心石沪”,那里的海湾确实楚楚动人,甚至超过了将校眷村前的海湾。



澎湖湾

但是在我看来,“澎湖湾”不应等同于“澎湖最美的海湾”,而应当是“外婆的澎湖湾”。远离潘安邦和外婆生活的地方,那海湾再美,也不是“外婆的澎湖湾”。将校眷村前的海湾呈弯月形向北延伸。我沿着海湾向北走去,那里有一大片银色的沙滩,那里有“阳光、沙滩、海浪”,还有“仙人掌”。哦,我终于找到真正的“外婆的澎湖湾”!

蒙古人有三宝:草原、骏马、长调。其中,长调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产物,游牧民族的产物,马背上的产物。在蒙古语中,长调称“乌日图道”,意即长歌。千百年来,蒙古人用长调赞颂自然、讴歌母爱、礼赞生命、诉说爱情,这流淌在蒙古人血液里的音乐,成为了蒙古族识别的重要标志,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只要听到长调,都会体味到其中那份独有的激动与苍凉。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自二〇〇〇年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增加了一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评选,两年一次的评选工作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同和欢迎。

二〇〇三年,蒙古人民共和国申报马头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给了拉苏荣等蒙古族艺术家一个启示,蒙古族长调完全具备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行列的条件。作为“中蒙两国蒙古族长调民歌联合保护专家工作小组”的中方委员,拉苏荣为之积极奔走,全力配合申报。

长调艺术是中国内蒙古地区和蒙古国共有的文化财富,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鼓励同一民族文化遗产实行两国或多国联合申报的倡议,当二〇〇五年蒙古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长调申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请求后,中国政府主动向蒙古国政府表达了联合申报的建议。

二〇〇五年七月,拉苏荣赴锡林郭勒草原看望病中的恩师——著名长调表演艺术家哈扎布时,带给他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一个月前,蒙古国政府接受了中国政府的建议,中蒙双方正式签署了《联合申遗协议书》。

这令病中的哈扎布兴奋不已,他郑重地拿出一个造型像鼻烟壶一般的蓝色打火机打着了火,示意拉苏荣取火。拉苏荣以为是老师要为自己点烟,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可哈扎布并没有理会拉苏荣的推辞,依然眼神执着地让火焰在燃烧着。

蒙古人视火为文明为希望,从古至今都在祭拜火神。拉苏荣忽然意识到,老师点燃的不是一簇普通的火焰,而是要他接上火,将长调艺术薪火相传。那一刻,屋里的气氛是那样的庄严、肃穆,感情的波澜是那样的紧张、剧烈。拉苏荣的眼睛湿润了,恭敬地躬下身来……哈扎布点燃香烟后,“啪”地关上打火机,将它重重



哈扎布和拉苏荣(右)

拉苏荣的申遗之路

兰宁远

地放在了拉苏荣的手里。当天,拉苏荣在这个打火机上贴上了一张白纸,上面郑重地写下自己永远要铭记的时刻:“二〇〇五年七月二十二日上午十点。”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公布了第三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单,中蒙两国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名列其中。至此,加上昆曲、中国古琴艺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中国已有四项艺术申遗成功。

哈扎布没有等到这一天,但可以告慰他的是,这次申遗得以成功正是因为他的学生拉苏荣。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高树茂在分析申遗成功的经验时说:“一方面,作为长调艺术歌唱家的拉苏荣,身体力行地把长调在中国发扬光大了。另一方面,作为长调音乐理论家的拉苏荣,一直在以研究和记录的方式让长调得以维护,他把中国长调表演艺术家的生平 and 理论记录下来,并将之进一步推广。”

申遗成功仅仅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如何保护好这份属于世

界的文化遗产,对于始终流传于民间的长调艺术而言,除了继续培养出一批优秀的歌者之外,首当其冲的是要在理论上形成相对完整的系统研究体系。

这同样需要一只领航的“头雁”。匈牙利音乐教育家柯达伊说:“音乐教育是通向民族最短的道路。”而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这条路因母语音乐教育的弱化而使路途人为延伸、杂草丛生。在内蒙古,曾妇孺皆知的东土默特部落、科尔沁部落、蒙郭勒津部落长调基本消失,仅有的几位“活化石”大多年事已高,在蒙文、蒙古国文和中蒙两国的音乐比较研究方面,更是一片空白。而要抢救这些文化遗产,既要懂蒙语、蒙文和蒙古国的文字,还要懂长调、懂艺术,熟悉蒙古族的历史和现状,了解蒙古族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所有的这一切拉苏荣都具备,

为了不让钟爱的长调艺术灭亡,他决心为宿命,拉苏荣甘愿做这只溯流而上的“头雁”,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又一条充满荆棘的漫漫长路。

二〇〇六年,拉苏荣代表中国出席了“世界蒙古人大会”,在会上,他被誉为“全世界蒙古人的大歌唱家”;也是在这一年,拉苏荣担任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蒙两国蒙古族长调民歌联合继承和保护工作委员会的中方首席专家,成为中国国家级文化艺术团体中唯一从事这项工作的艺术家。

二〇〇七年初,内蒙古长调艺术交流研究会宣告成立,拉苏荣被选为会长。在他的倡导下,内蒙古的各盟市都相继成立了长调协会。国际长调民歌大赛、国际长调民歌理论研讨会、电视长调歌曲大赛、呼伦贝尔“宝音德力格尔杯”长调比赛、锡林郭勒盟“昭那斯图杯”长调比赛、乌珠穆沁草原广场长调演唱会……一系列以长调为主题的文化活动在草原上接连举行。

二〇〇九年的十一月六日,拉苏荣在锡林郭勒盟组建了“拉苏荣艺术工作室”和锡林郭勒长调协会。随后,他接连两年分别举办了潮尔道培训班和察哈尔长调暨阿斯尔培训班。拉苏荣之所以选择潮尔道和阿斯尔作为他口传心授的内容,是因为锡林郭勒盟的长调由保留传统特色的乌珠穆沁长调、阿巴嘎、阿巴哈纳尔地区的潮尔道和察哈尔长调组成。目前乌珠穆沁长调方兴未艾,可是潮尔道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而阿斯尔则是对察哈尔草原流传的一种古老音乐的统称,最初属于皇家贵族,是元代盛行的蒙古族宫廷音乐,被称为“宴曲之首”。阿斯尔音乐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逐渐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拉苏荣办好这两个班的目的很简单,